



寸心许山河

——从崇安走出的台湾抗日义勇队、少年团

这是一份珍藏在武夷山市档案馆,民国二十六年台湾抗日第一名将李友邦将军写给时任崇安县长刘超然的信件。翻开这卷珍贵的史料,那段沉重的、波澜壮阔的台湾同胞与大陆人民并肩作战、共同抵御日本侵略,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尊严的英勇事迹跃然纸上,台湾同胞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与我们共同筑起坚不可摧的民族防线。

李友邦将军原名李肇基,祖籍福建厦门同安,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县芦洲乡,是台湾义勇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少年时期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的暴行后,就立志献身祖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保卫祖国,解放台湾。1924年,李友邦在台北师范就读期间与“台湾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林木顺等人,组织夜袭台北日本警局,遭到了日本殖民当局通缉,随后辗转来到广州,并进入黄埔军校(二期)参加学习。在校期间参加过台湾学生联合会、台湾革命青年团等组织,受到了廖仲恺先生的栽培,与共产党联系密切。离开黄埔军校后,李友邦曾主持由国民党两广省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往返于台湾、东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并在孙中山先生的支持下组织成立了“台湾独立革命党”,自任主席。

1932年2月,由于频繁参加抗日反蒋地下活动,李友邦被捕入狱,其间,他的两个弟弟先后被日本特务杀害,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李友邦被释放。出狱后的李友邦,在大家的努力下,恢复了在大革命时期成立的“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独立革命党”是民国十三年,李友邦在广州组织成立并一直领导下奋斗了将近二十年的一个党,他们一直在困难中工作着,其间牺牲了不少的同志,他们对台湾革命的前途与中国抗战的关系相互衡量研究后指出:“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欲致力于台湾革命的成功,必先致力于中国抗战的胜利。”秉此原则,他提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两大口号,号召台湾同胞共同为反抗日寇的民族革命救亡运动而奋斗,1938年10月,流亡在中国的朝鲜爱国同胞在汉口成立了朝鲜义勇队,从事瓦解日伪军的政治工作。李友邦深受鼓舞,决定仿照朝鲜同志的做法,成立一个台湾义勇队,把台胞组织起来参加抗战。为了便于号召台胞,李友邦决定用“台湾独立革命党”的名义来组织台湾义勇队,自己以“主席”的名义进行工作。工作开始后,首先公布了《台湾独立革命党最近行动大纲》和《台湾独立革命党告台湾同胞书》两个文件,分别刊登于1938年《福建民报》福州版第三版;台湾独立革命党最近派李友邦、张一之两人由浙来闽,先到崇安民垦殖区视察。该区台民共有四百余人,生活非常安定,经李、张二人详加劝导后,均大觉悟,自愿参加前线抗战,或担任救护工作。和1939年《东南战线》第一卷第四期,并铅印散发。

1938年,在金华出版的《东南日报》也发表了一则消息:台湾独立革命党为响应祖国抗战,完成自身解放,派李友邦等回国唤起国内同胞一致奋斗。项振南北某地,并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动员全体台胞,立即奋起反抗暴力,解除亡国痛苦与耻辱。1938年5月,金门、厦门相继失陷,福建省政府将散居在福州、漳州、泉州、晋江、石码等沿海的台湾同胞414人,先后分四批迁移到崇安县(今福建省武夷山市)安置,并成立了“台民垦殖所”,附设“台童教养所”。随后截至1946年,陆续又来了155人,这些台胞大多数都是台籍医生,还有留日过的学生。在台湾时受日本政府和台湾医界的歧视排挤,先后来到福建一带行医,到崇安后编入保甲,居住在贞光学校、文庙和民权路一带(东峰街125号),李友邦先生来崇安了解情况后,在县长刘超然的支持下,召开动员大会宣传抗日,动员同胞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战贡献力量。1938年11月27日《福建民报》载:“集中崇安台胞,参加祖国战线,已组义勇队救护队,不久当可出发前线。”

1939年1月,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政治部批准,台湾义勇队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李友邦、张一之、郭汝侯、林心平、张应璋等五人任筹备委员。同年2月22日,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在浙江省金华县城酒坊巷18号正式成立,李友邦任台湾义勇队队长和台湾少年团团长。截至1941年底,共有崇安籍台民92人,家属11名,合计103人赴浙江参加台湾义勇队、少年团。

民国30年编纂的《崇安县新志》曾简单记载: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发生,金门、厦门相继失陷,福建省情势告急紧张。省府深恐若辈(指台胞)良莠不齐,易致敌人利诱,影响抗战,于二十七年六月将居留沿海台民432人遣送来崇,就中从晋江来者262人,从福州来者170人(内日归3人)。二十八年七月又将留置连城台民54人及各部队、各县政府留置台民21人一并送县集中,分作两处收容,在一孔庙,一在贞光学校,并照保甲规程编组保甲,推定保甲长。计孔庙编一保,贞光学校编一保,另派管理员负责指挥监督之责,阅时三月,所有膳食统由省库拨县转给,成年每口一角,儿童七分。以当时本县生活程度,差可果腹。旋奉省府令,在其境内自由谋生。从此化整为零,散居各处,管理之责归警察局。十一月间,台湾独立革命党首领李友邦氏由浙来崇,组织台湾义勇队,准备参加台民男女一百零八人,于二十八年二月出发金华。若辈或善(擅)长医术,或善操日语,在战地担任救护工作,允称适当。

台湾义勇队成立后,就立即开始有计划地投入抗日活动。他们主要开展对敌政治工作、医疗救护工作、后方生产工作、宣传教育工作。张一之还编写了队歌和团歌,由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和义勇队编辑通讯组组长牛光祖分别为队歌和团歌谱曲。这些激动人心的消息曾连续登载在1939年3月2日、9日的《东南日报》上。

医疗救护是义勇队抗战活动中最具成效的工作。崇安的“台民中以医生为最多”,多达52人。由于抗战时期,国内医务人员紧缺。台湾义勇队成立后,率先设立了医疗工作站,其后在浙江金华城内、方六乡、建头塘以及义乌亭镇设立了分诊所;组织了流动医疗队,义务巡回治疗金华地区城乡病人;救治第三战区所在部队伤员以及协助部队单位的医务工作等。台湾义勇队的医务工作开展后,受到当地民众和抗日部队的欢迎,工作量也急剧增加,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李友邦对义勇队的医疗工作进行了扩展。1939年7月初,金华城内的医疗站改建为“台湾医院”,后来又命名为“第一台湾医院”。此后,义勇队为了进一步满足后方医疗服务的需要,于1940年12月15日在浙江衢州正式开办“第二台湾医院”;1941年2月,义勇队又在浙江兰溪设立“第三台湾医院”,1942年在福建建阳成立“第四台湾医院”。

“第一台湾医院”成立之初,由于经费缺乏,每个队员都把自己的生活费抽一部分作为开办费用,对于赤贫的病人,挂号金之类的费用一律免除;“第三台湾医院”,“凡穷人、士兵来诊病,均予免费”,为了病人的方便,台籍医生们无论是吃饭时间,还是在深夜,只要病人求诊,立即给予救治。在长期的战地医务工作中,台湾义勇队的医务人员毫无怨言,不分昼夜,不辞辛苦,展现了高度的奉献精神,也因此得到前方将士和当地民众的赞扬和尊重,医者仁心被尊称为“台湾医生”,这一饱含敬意的赞誉,正是医德与民族大义的体现。

从事后方生产,是台湾义勇队抗日活动中的另一个重要工作。除了医疗技术外,台湾义勇队中还有不少技术人员,他们掌握重要战略物资樟脑或药品的制作。樟脑和樟脑油是重要的军需品和医药用品,亦是当时中国抗战迫切需要的紧缺物资,抗战期间,军用原料之樟脑与樟脑油国内极缺,价格昂贵。崇安盛产樟树,鉴于朱春海等人对于制造樟脑有丰富经验,1939年4月,台湾义勇队协助福建省建设厅,在崇安县设立樟脑制造厂,出产不少的樟脑;1939年8月至9月,在台湾义勇队的协助下,浙江省建设厅在丽水县设立樟脑厂;1940年3月,台湾义勇队队员庄惠民等人前往金华东关乡产品生产合作社,义务从事药品制造工作等。在后方的生产中,台湾义勇队的樟脑和药品生产技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金华东关乡的药品制造完全采用国内原料,这解决了抗战

时期日军海上封锁,进口原料不易获得的难题,生产战场上所迫切需要的麻拉利亚药水、皮肤病药膏和需求量大的胃病特效药等,缓解了抗战时期的药品紧缺问题,挽救了众多抗日战士和民众的生命。

宣传工作是台湾义勇队影响较为深远的抗日活动。宣传工作以口头宣传、文字宣传和文艺宣传为主。在文字宣传上,台湾义勇队出版了《台湾先锋》《台湾革命从书》等刊物,后期还创办了《台湾青年》报,这些刊物对于宣传台湾革命历史、探讨台湾革命运动理论,报道台湾义勇队与少年团的抗日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宣传。而少年团在衢州公演的独幕剧《台湾少年》以及《为了大家》等节目,受到各界好评,当时有报纸报道:

“……在故乡(台湾)受敌人之压迫,因此造成强大奋斗之精神,英勇革命的情绪……”

1946年元旦,李友邦在台湾电台广播《新台湾建设的意义与前途》,指出台湾民众必须“永远与中华民族同生存共命运”。1946年2月,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遭政府无端勒令解散。在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中,李友邦由于积极响应、参与两次国共合作,并在“匪谍叛乱”罪嫌于1951年11月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并于翌年4月惨遭杀害,时年仅46岁。

1946年4月,海峡两岸先后召开了纪念李友邦先生逝世40周年大会,台湾义勇总队、少年团的队员、团员及数十家的有关单位、团体的专家学者、社会各界贤达参加纪念会,共同追思李友邦将军的丰功伟业,回顾昔日的斗争生活。

1946年9月15日,当年少年团小队长王正南亲临武夷山苍屏峰,察看当年的标语,花了3个多小时把当年书写的“打倒日寇,保我中华”等大字用鲜红的颜料重描一遍。表达了对当年战友的崇敬之情。

1946年9月,这里迎来了一位老人,被称为“抗日花木兰”的李友邦夫人严秀峰女士,严秀峰女士应邀到北京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系列活动,不辞辛劳,风尘仆仆来到武夷山。不仅挨家挨户走访慰问落籍在武夷山的台胞后裔,还瞻仰了原台湾抗日义勇队驻地。随后严秀峰女士在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了苍屏峰下,当“打倒日寇,保我中华”映入眼帘时,她不禁热泪盈眶,饱含深情地说:“我要把这幅标语拍下来,带到台湾,为李友邦将军纪念馆增添一份珍贵文档”。严秀峰女士凝望着武夷群峰,吟哦:长忆当年抗日寇,少年壮志喜已酬。振兴中华跨世纪,两岸同胞共携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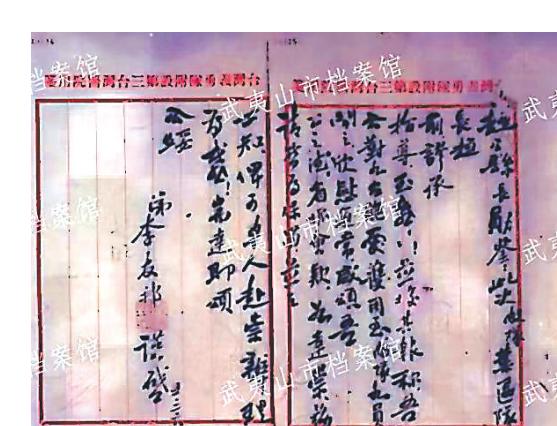
台湾义勇队是抗战时期全国唯一一支由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组成的、有正规军编制的、直接参加祖国抗战的队伍,是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的杰出代表。其抗战活动是台湾自1895年沦陷后台湾人民始终不断的抗日斗争的延续,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台民集中地和台湾义勇队的发源地的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尤其重视台胞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对当年“台民居住地”和他们在苍屏峰留下的抗日标语加以保护修缮。这些史迹不仅见证了那段山河破碎、烽火连天的岁月,更是两岸同胞同呼吸共命运的见证,我们要铭刻台湾革命先辈们的民族正气,反殖民精神,凝聚两岸同胞民族情,推动祖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2025年6月,“台湾义勇队档案”成功入选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武夷山市档案馆 李夷)



1995年李友邦夫人严秀峰女士在“打倒日寇,保我中华”摩崖石刻下的留影



1939年2月19日,崇安县县长刘超然关于召开欢送大会热烈欢送留崇台胞二十二人赴金华参加台湾义勇队致福建省人民政府代电。



台湾革命领袖、台湾抗日义勇队队长李友邦给崇安县长刘超然的信函

